

才子兄弟冤家手足

魯迅與周作人 (二)

● 王尚寬

為學日語出入寄席

一九〇九年八月，周作人結婚，娶日本女人羽田信子為妻。魯迅在他婚後不久回國，有大哥在，周作人一切都不用操心，幾乎連日本話都不用講，全由魯迅代勞。魯迅走後，他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學好日本話，他決定到民間去學習活的日本話，恰巧在他住的本鄉有日本人稱為「寄席」的雜耍場，暇時他就到「寄席」去聽「落語」，亦即中國的單口相聲。在落語中，周作人驚奇的發現日本民情和語言文字的諧趣，這在中國本不缺乏，可惜已被道家們摧殘殆盡。他邊聽邊學，當上課也當作娛樂，竟發現日本文化中的「川柳」和「狂言」，川柳是七七音組成的諷刺詩，注重諧趣和文字的戲弄，也重形式。好

的川柳，能真實的抓住情景，揭穿人情的機微，讀之令人會心微笑，又帶一抹輕愁。「狂言」表演多用流行口語，表現下層人民的價值。審美觀和社會俗見，比川柳更輕鬆詼諧。周作人稱之為「有情的滑稽」。

進窺民俗文學堂奧

從民間趣味文學開始，周作人逐漸關注重人文學的「俳諧」，「俳諧」是「俳諧連歌」的縮稱，將短歌的三十一音分作五七五及七七兩節，由兩個人各作一節，聯續下去，其中常含有詼諧的意思。後來覺得一首連歌中間，只要發句，即五七五的第一節，也可以獨立成詩，是為俳句。這些弄俳諧的人所寫的文章，又稱俳文。這樣，俳諧連歌、俳句、俳文，就成為一

種「俳諧體」。其實，俳諧的名稱出於中國；「史記滑稽列傳·索隱」云：「姚察云，滑稽猶俳諧也」，杜甫集中也有「戲作俳諧體遣悶二首」之說。俳諧體，無論詩歌、散文，最大特點是「用常語寫俗事」。周作人的興趣首先在其語言特色，然後通過語言而進入其內蘊，即是周作人所謂的「俳境」。周作人將其歸結為三：一、是高遠清雅的俳境，二、是諧謔諷刺，三、是介在這中間的蘊藉而詼詼的趣味。周作人由欣賞許多俳句大師的作品中，進入了日本文化的殿堂。

接著周作人閱讀日本當代作家的作品，夏目漱石、佐藤春夫、有島武郎、森鷗等名家作品，他都搜集細讀，深究日本文化的周作人後來被認為是深知日本人的「日本通」即種因於此。他認為日本語言文

化有其獨立性，但對日文中混用漢字不以為然，他說：「日本語與中國語在系統上毫無關係，只因日本採用中國文化，也就借了漢字過去，至今沿用」在周作人看來，「日本文中夾著漢字是使中國人不能深切地了解日本的一個障害」，就因為它很容易使中國人忽視日本文化（包括日本語）的獨立性，而把它看作是中國文化（漢語）的附屬。周作人總結他的經驗，歸結為一點，要真正研究、把握日本語，就「須知道這語言也有他的生命，多少要對於他感到一種愛好與理解」。對於日本文化，也是如此。愛好與理解的關鍵在於尊重，尊重日本文化、語言的獨立個性。

這才是周作人對日本文化（包括日本語）的把握能夠達到深度的真正原因。

中國古風重現日本

周作人研究日本，超越了一國或一民族的侷限，是由直觀的親切感切入，再升到新高度。他在回憶錄裡寫道：「我們去留學的時候，一句話都不懂，單身走入外國的都會去，當然會要感到孤獨困苦，我卻並不如此，對於那地方與時代的空氣不久便感到協和，而且也覺得可喜，所以我

曾稱東京是我的第二故鄉，頗多留戀之意。一九一一年其間，所作古詩中有句云，遠游不思鄉，久客戀異鄉，即致此意。」他的出發點是將日本文化和中國文化看作人類同一類型文化的，已超越了故國和故鄉的感情。

一九一〇年十一月，周作人偕妻搬離本鄉區，住進留學生極少的麻木區森元町，直接原因自然是經濟，鄉土研究也是因素。他在森元町過的「游惰的生活」，白天偷懶不去上課，躲在家中小樓上看小說或俳句，晚上逛書店，使他最難忘的還是森元町的人，右鄰裱糊工的女兒因為與後母不和，漸漸流為「不良少女」。每天午後，胡同裡就聽見有男子在吹口哨，她便溜出門去，到附近的芝公園裡與她的那些男女會合。晚上父親回來，聽了後母的訴說，照例來一通大嚷大罵，以致痛打，但有什麼用呢？第二天到那時候，口哨又來了，弱小的心靈恍如受了符咒的誘惑，不知不覺間仍舊衝了出去，結果又是一場吵鬧。有鄰居勸她：「你也何妨規矩點，省得你父親那樣生氣呢？」她卻笑嘻嘻地回答：「你不知道在外邊玩要是多麼有趣呢！」周作人在一旁聽見了，覺得很有意思

；他想，這日本女孩子的話是值得人們去思索、玩味的。

赤羽橋左邊，還有一位理髮師。周作人也常去光顧，雖然不曾談什麼天。這位理髮師據說也有妻子，卻獨自住著，店面設備很考究，也頗清淨，價格也格外的高。人們都傳聞他有神經病，周作人每隔兩三星期去理一次髮，卻也沒有發現他有什麼異常的行動。但此人性情乖戾與孤獨，大概是確定無疑的。周作人把他叫作「畸人」，這也算得上「市井人物」之一。

晚年，周作人寫「知堂回憶」時，找到一張舊紙，沒有題目，其文曰：「庚戌秋日，偕內人、內弟重久及保坂氏媪早出，往大隅川釣魚。經蓬萊町，出駒入病院前，途漸寂靜，隘但客車，兩旁皆樹木雜草，如在山嶺間。徑盡忽豁朗，出一懸崖上，即是田端。下視田野羅列，草色尚青，屋宇點綴其間，左折循崖而下為大路，夾路流水涓涓然。行未十丈許，雨忽集，以雨具不足，躊躇久之遂決行。前有田家售雜品，擬求竹笠，問之無應者。重久言當冒雨獨行，乃分果餌與之使去，而自先歸。遂至田端驛，乘電車至巢鴨，欲附馬車而待久不至，保坂媪請先行。未幾車至

即乘之。意媪去未遠，留意觀之，見前有人折旗負包而行，呼之果媪也。令同乘。至鈴木亭前下車，雨已小霽。歸家飢甚。發食合取團飯啖之甚旨，其味為未嘗有也。未幾雨復大至，旁午重久亦返，言至川畔而雨甚，因走至羽太家假傘而歸，所持餌壺釣竿，則已棄之矣。是日為月曜，十月頃也。」

這是地道的日本「寫生文」了，雖然周作人自覺幽默味不足。但已是相當的日本化了；或者說他終於找到了「自我」與「日本文化」（以及中國傳統文化）的契合點。

經濟困窘母命回國

由於母親及大哥催促，周作人於一九一一年九月攜妻歸國。他原本留戀在日本的生活，回國的原因是「錢」，當他寫信給魯迅，說打算在日本「略習法文」，魯迅的回信卻是「法文不能變米肉」，魯迅同時告訴他，頭一年（一九一〇年）已將祖宗留下的祭田賣絕，資亦早罄，家裡已是山窮水盡，無力維持他繼續讀書了。深愛並深知二弟的魯迅當然知道用這樣的方式擊碎他的夢，未免過於殘酷，但魯迅也

自有難言的苦衷。他在寫給許壽裳的信中談到此事時說：「使二年前而作此語，當自擊，然今茲思想轉變實已如是，頗自憫嘆也」，比起乃弟來，魯迅更有勇氣吞下「現實」的苦果。

回到家鄉，生活在親人中間，他竟有一種陌陌生感。直覺告訴他：他心中的「中國」不在這裡——這裡太嘈雜，太混亂，也太骯髒，太狹窄；屬於他自己的「中國」應該是充滿詩意古趣，自由而自然的。在異國的日本，他曾經覓到了它，如今一踏上故土，反而失落了，彷彿被那茫茫的大海吞沒。

陷入寂寞與孤獨中

周作人沉湎於自我感情矛盾中不能自拔，以致對身邊的「暴風雨」幾乎熟視無睹。就在周作人歸國後的第二個月，辛亥革命爆發了，接著浙江省城起義了，只隔著一條錢塘江的紹興陷入一片混亂。但周作人連門都沒有出，只躲在家裡抄整本的劉義慶的「幽明錄」。從日本帶回的書堆裡，翻檢出一年前所寫「大隅川釣魚記事」，周作人彷彿又經歷了那場始而悠悠、繼而滂沱的東京雨……，不禁感慨萬千，

在文後加上一段附記——

居東京六年，今夏返越，雖歸故土，彌益寂寥；追念昔游，時有接觸。宗邦為疏，而異地為親，豈人情乎？心有不能自假，欲記其殘缺已自慰焉，而文情不副，感興已隔。用知懷舊之美，如虹霓色，不可以名。一己且爾，若示他人，更何能感？……

家鄉的疏離，他人的不理解，都使周作人感到一種難耐的孤獨。「懷舊」本不足靠，只能「任其飄泊太虛，時與神會，欣賞其美」，聊以自慰罷了。

幾天後，周作人夜不成寐，又披衣而起，賦詩一首——

遠游不思歸，久客戀異鄉。

寂寂三田道，衰柳徒蒼黃。

舊夢不可道，但令心暗傷。

在熱血沸騰的大時代中，冷靜如魯迅者已被捲入，而周作人關在書齋中與古籍為伴，顯得越發孤獨了。其實，周作人對革命並非漠視，他在冷眼旁觀，光復後的浙江一片紊亂，軍閥掌政，爭權奪利，使命感促使他陸續發表了一批文章，其中在「民國之徵何在」一文中寫道：

昔秋女士被逮，無定讞，遽遭殘賊。

天下共憤，今得昭復。而章介眉以種種嫌疑，久經拘訊，亦獄無定讞，而議籍其家。自一面言之，可謂天道好還，且一面言之，亦何解於以暴易暴乎！此矛盾之一例也；更統觀全局，則官威如故，民瘼未蘇，嗚呼！昔為異族，今為同氣；昔為專制，今為共和。以今較昔，其異安在？由今之道，無變今之俗。

這是一個令人戰慄的「發現」：「昔為異族，今為同氣；昔為專制，今為共和」，眼花撩亂的變動中，骨子裡根本「無變」，「共和」不過是「專制」的變種，中國的歷史重又發生了一次循環。

周作人的發現、感受連同憂慮和疑懼是大大的超前的，沉默的大多數國民不能理解，一些先驅者沉醉於勝利的凱歌也無所理解。他的大聲疾呼得不到回應，周作人陷入他大哥魯迅在《吶喊·自序》裡所說的寂寞與孤獨之中——

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，無可措手的了；這是怎樣的悲哀呵，我於是以我所感到者為寂寞。

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長大起來，如大毒蛇，纏住我的靈魂了。

周作人和他的大哥的心畢竟是相通的

浙江省軍政府教育司長沈鈞儒委任周作人任某科課長，後又改任視學，周作人態度消極。一九二二年五月，羽太信子生一男孩，取名周豐一。這年六月他到杭州赴任；住在教育司辦公處樓門口一間陰暗的小屋裡，每日只是坐著，看自己帶來的書或翻譯自己喜歡的作品，看倦了，寫累了，就隨便倒臥在床上，幾乎足不出戶，全不管視學職務範圍內的工作。當時也在教育司的錢玄同，因此給周作人加了一個考語，說是在那裡「臥治」，這倒是十分確切的。大約做了一個月，拿了九十元的薪水，買了一部陶淵明集，餘資作旅費就回紹興去了。浙江軍政府重視教育，委魯迅為師範學校校長，因為魯迅有舊學生在辦報，多說了閒話，軍政府不高興，魯迅就自動辭職了。

充滿強烈民族主義

中華民國成立後，大權握在袁世凱的手裡，自然預伏危機。一九一三年春天，

周作人應聘為浙江省立第五中學英語教師，任教達四年之久，為的是養家活口。離開第五中學校，到紹興教育會任會長，縣

署每月給教育會五十元津貼，總得做點事，就辦起「紹興教育會月刊」來，辦刊物就得寫稿，於是他翻譯和撰寫了一些兒童教育的理論，他在「兒童問題之初解」（載《紹興教育月刊》第六號）一文中這樣寫道：

一國興衰之大故雖原因複雜，……然考國人思想視兒童重輕何如，要亦一重因也。蓋兒童者，未來之國民，是所以承繼先業，即所以開發新化，如其善遂斯舊邦可新，絕國可續，不然，則雖當盛時而赫文明難為之繼；東方國俗尚古守舊，重老而輕少，乃致民志頹喪，無由上徵，彼以兒童屬於家族而不知外有社會，以兒童屬於祖先而不知上之有民族，以是之民為國後盾，雖開關之世猶或不可，況在今乎！

字裡行間充滿了強烈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情緒。周作人把兒童視為「未來之國民」，將兒童教育與民族的興亡直接聯繫起來：這正是這一時期他教育思想的基

關注兒童教育問題

周作人有關教育的譯著中，始終貫串著兩個互相關連的思想，一是順應自然本

性的發展，「教育之力，但得順其固有之性，而激勵助長之，又或束制之，使就範圍，不能變更其性」；二是尊重兒童的獨立個性，即確認「兒童是大人之胚體，而非大人之縮影」，由此而建立的教育原則，必是「以兒童為本位」。這顯示了周作人思考的特色。

周作人早在關注兒童教育問題之前，就開始了童話研究；他的第一篇論文「童話研究」就寫在他任職浙江第五中學以前。以後他陸續寫了「童話略論」、「古童話釋義」及「兒歌之研究」等論文。

周作人在童話與兒童學的研究中發現了「趣味」的重要性。他在所著「遊戲與教育」中提出的如下觀點：藝術不但起源於「遊戲衝動」，「即藝術製作之態度中，亦必多少含有遊戲分子」，「小兒生活，半為遊戲，教育之事，亦當寓於其中」，故提倡「趣味之教育」將「遊戲」與「趣味」引入教育，明確地提出「美育」的要求，這構成了周作人這一時期教育思想的另一個重要方面。一九一四年七月，周作人在魯迅籌辦全國第一次兒童藝術展覽會的啟示下，主持紹興縣小學校成績展覽會，就是這一教育思想的具體實踐。這也

可說是他任紹興縣教育會會長期間的主要治績。

任教北大巧逢復辟

一九一七年周作人應北大校長蔡元培之邀，任希臘文學史及古英文課程教師，這個差事據說是許壽裳推荐的，不過蔡元培也是紹興人，跟周作人是小同鄉，光緒末年還被蔡請去協辦學務公所，早就是舊識，所以欣然同意。而蔡元培辦北大，打出的口號是「學術平等」與「思想自由」，使周作人也覺得可以發揮，遂決意北上。此時，北京正處於新文化勃興時期，英、法、德、俄、美各類思潮雜陳，正是歷史的轉捩點，周作人抵達後，住進魯迅寄居的紹興縣館補樹書屋，環境相當幽靜，符合他的個性，不過緊鄰前清殺人的地方菜市口，雖然時過境遷，仍令人有毛毛的感覺。

北京縣會館生活中最有趣的事是兄弟貪夜捉貓，會館雖是舊屋，老鼠卻不多見，倒是不知道誰家的貓常來騷擾，特別是交尾時的嗥叫，叫人心煩，整夜睡不著覺。魯迅與周作人兄弟倆常大怒而起，周作人搬了小茶几，在屋簷下放好，魯迅便上

去用竹竿痛打，把它們打散，但也不能長治久安，往往過了一會兒又回來了，於是再打。儘管當時怒不可遏，事後想起卻覺得未免認真得可笑，彷彿又都回到了兒童時代一般。

抵北京後，周作人向北大報到，不料蔡元培告以學期中不能增加新課，要他暫教預科的國文，他本想一怒回紹興，蔡元培卻想了個折衷辦法，讓他在北大附設的編纂處擔任編纂，月薪一二〇元，如此安排，周作人只好接受。這一留北京多了一位新文化的大將。

在北京待了一個多月後，發生張勳復辟事件，這一天是七月一日，因為是夏天，兄弟倆起得早，正準備往琉璃廠去，突聽會館的人說，街上已插滿龍旗了，其實「復辟」的氣氛早已瀰漫，是遲早要發生的事。但兄弟聞之內心不快，魯迅迅速辭去僉事一職，準備南歸，因無川資，只好坐等。周作人往訪蔡元培，見他十分鎮靜，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事後，周作人留下簡短紀錄：

七日晴。上午有飛機擲彈於宮城。十一時同大哥移居崇文門內船板胡同新華飯店。

九日陰。托齊君打電至家，報平安。夜，店中人警備，云聞槍聲。

十二日晴。晨四時半聞炮轟聲，下午二時頃止，聞天壇諸處皆下，復辟之事凡十一日半而了矣。出至八寶胡同，擬買點心，值店閉，至崇文門大街亦然，遂返。

晚同大哥至義興局吃飯，以店中居奇也。

十三日晴。上午同大哥往訪銘伯、季第二君，飯後至會館一轉，上午三時後回飯店，途中見中華門匾復掛上，五色旗東城已有，城外未有。晚飲酒，夜甚熱。

十四日晴。上午十時先返寓，大哥隨亦來，令齊坤往取鋪蓋來，途中五色旗已遍矣。改懸竹帘於補樹書屋門外，稍覺涼爽。

日記裡屢次提到龍旗與五色旗，這表示了——一種感情的；龍旗代表滿清的勢力，所以有看了覺得憎惡；後來看見臨時粗制的龍旗，畫的龍有些簡直像一條死鱧，心裡很是痛快。及至五色旗重又掛正，自然是驚喜之餘，情見乎辭了。可是後來這五色旗變成了北洋軍閥的旗幟，便又覺得不順眼。

張勳復辟事件結束了，但在周作人、魯迅和他們的友人中間，復辟事件的陰影

卻怎麼也抹不掉，拂不去。他們熱烈地討論，痛苦地思索，久久不能平靜，直到一九二〇年十月，他仍然在「消化」這場復辟風波。

甚至到一九三六年，魯迅逝世前還在為人們「逐漸遺忘」復辟事件而感到憂慮與憤慨。周作人於二十年後在故紙堆中，翻出了當時寫的兩首詩，抄錄於他的「知堂回想錄」中——

其一：天壇未灑孤臣血，地窖難招帝子魂。一覺蒼黃中夜夢，又聞蛙蛤吠前門。

其二：落花時節無多日，遙望南天有淚痕。槐叢未成秋葉老，閑繡土偶坐黃昏。

兄弟合作學術著作

八月起，魯迅、周作人在東京時代的老同學錢玄同便經常來會館訪問，通常是午後四時來，吃過晚飯，談到十一、二點鐘，回師大寄宿舍去。聊天的話題自然十分廣泛；但中心卻常不離張勳復辟事件，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思考。周作人回憶，這正是錢玄同由「復古」往「反復古」方向更前進的一個轉折，錢玄同在和周氏兄弟

談話中大約有提倡「非聖」、「逆倫」，鏟除「東方化」，用合力來「用夷變夏」之類的主張，而錢玄同所謂偏激言論大抵有二，一是「應燒毀中國書」，二是「應廢除漢字」。

據說魯迅曾對錢玄同說，中國最好改用一種外國文字如德文；若辦不到，則仍寫漢文並多屬用外國文字。魯迅的「狂人日記」與錢玄同的「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」都發表在復辟事件後的一年，其內容顯然都曾在補樹書屋裡討論過。錢玄同在「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」裡提出「欲使中國不亡，欲使中國民族為廿世紀文明之民族，必以廢孔學，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，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，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解決。」錢玄同特地申明，這並非完全是他個人的意見，他是「代朋友立言」，而「朋友」指的就是魯迅。儘管有關回憶都只提到魯迅與錢玄同，但可以肯定，周作人即使不是上述偏激言論的發明者，也並無異議。周作人則把從張勳復辟事件中引出的教訓歸結為一點：「因為經歷這次事變，深深感覺中國改革之尚未成功，有思想革命之必要。」這都說明，周氏兄弟與錢玄同在補樹書屋槐樹下

的討論，是為爾後他們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奮鬥作好了思想上的準備的。

一九一七年九月，復辟事件煙消雲散，周作人收到北大正式聘書，任文科教授兼國史編纂處纂輯員，月薪二四〇元，每週上羅馬文學史三學時，歐洲文學史三學時，六節課連同編講義，夠忙的，他每天把草稿寫好，晚上由魯迅作文字修正，第二天謄正並起草，如此費時一年，完成希臘文學要略一卷、羅馬文學一卷，歐洲中古至十八世紀文學一卷，合成一本歐洲文學史，作為北大叢書，由商務印書館出版，這是周作人生平首部學術著作，也是兄弟合作的紀念。

除文科外，北大還設立了研究院。一九一七年開始，分哲學、中文及英文三學門，由教授自擬題目，分成教員共同研究及學生研究兩種，周作人參加了「改良文字問題」及「小說研究」兩組，前者還有錢玄同、馬裕藻、劉文典，後者有胡適及劉半農。胡、劉、周都作過報告，周作人的講題是「日本近卅年小說之發達」，講稿發表後在學術界產生很大的影響，成為中國現代小說理論的奠基之作。（未完待續）

最低廉的售價。最熱門的好書

褚問鵬著 花落春猶在

第一、二、三冊出版

合售新台幣陸百元

名作家褚問鵬女士，浙江嘉興人，北京大學中文研究所畢業，五十年前任十八軍上校秘書，軍委會戰幹團訓育主任，廣東省政府參議，本書為褚女士精心傑作，懷舊憶往，文字生動詳實，女性讀者，往往抱書而哭，感人之深，可以想見，要目有：童年的回憶。蠟炬成灰淚始乾。山西歷險記。從晉北到故鄉。重到申江更斷腸。撫孤自苦甘零落。空花到眼總無緣。道是無情卻有情。「一二八」烽烟驚客夢。戎馬馳驅十五年。靈耗傳來摧肺肝。西安事變拾零。戰時的訓練工作。湖北的戰時省會。千里奔波探兒病。居然生入玉門關。綠茶紅梅相映生輝。幾時歸夢到江南。南湖烟雨憶當年。解甲歸田成一夢。母子癡癡細談別後。廉頗未老氣壯山河。榴花紅映舊征袍等篇。

全書分裝叁冊合售陸百元，歡迎購閱。
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—二號聖文書局帳戶。